童　　年

〔瑞典〕施舟人　撰*　袁冰凌　译

我出生于1934年，正是希特勒的纳粹运动在德国猖獗得势时。这对我的童年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影响了我一辈子。

我父母是荷兰知识分子。父亲克拉斯·施佩尔在荷兰北部离阿姆斯特丹不很远的一个叫水手村的小村庄当牧师，母亲约翰娜（汉妮）·高柏是作家，主要写儿童作品，他们两人都是社会主义者。1940年，德军占领荷兰，并开始把犹太居民驱赶到集中营，这时我父母参加了地下抵抗运动。1943年，他们被人出卖。父亲身陷囹圄，我和母亲、哥哥，以及一个母亲从德国人手中救下的，与我同龄的犹太男孩，藏在阿姆斯特丹老城中心，幸免于难。可是我们过得很艰难，母亲在这期间受过伤，终身致残，我自己差点饿死。

“二战”结束后，我父母还活着，但由于战争的影响，他们很快相继去世。随着他们的病故，我的童年也结束了。

然而，尽管发生了那些事情，我不能说我的童年不幸。我的父母都是很独特的人，他们不仅爱自己的孩子，对其他弱者也充满爱心。父亲是个学者，有神学博士学位。我至今还记得他坐在四周都是书架的书房里的样子。他总是在读书或写作。他允许我在他的书房里玩，我常常从书架上取下那些触手可及的书来搭建城堡。他的书桌上方挂着两幅肖像：一幅是耶稣，另一幅是列宁。他善良、腼腆，从不说人长短。除了从事神学研究，他生活中的最大乐趣就是与同事和朋友交流思想了。每个星期天下午都有客人到我家来，把客厅挤得满满的。

* 此文是作者原书的前半部分，详见〔瑞典〕施舟人：《童年》，乐黛云、〔法〕金丝燕主编：“远近丛书”第15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他们一边喝茶或咖啡，一边兴趣盎然地聊着各种话题。这种讨论往往持续好几个小时。天渐渐地黑了，屋里的光线也暗了，可是讨论仍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那时荷兰的主餐是午餐，晚餐很简单。晚上客人离开前，大家吃点面包，喝点牛奶和蔬菜汤。在这样的周日下午，我就会坐在地板上，或挨着妈妈坐在小凳子上，听大人们谈天说地。虽然不知所云，却觉得其乐融融。

母亲充满了活力，目光深邃有神，卷发乌黑，皮肤白皙，身材健壮却不臃肿。她喜欢户外活动，常在菜园里干活。离我们的村子不远是荷兰著名的长海堤，她还喜欢带我们在海堤一边的小海湾里游泳。她在创作和其他活动中表现出特有的引人注目、教养和创造力。很年轻时她就摆脱了基督教家庭传统教育的束缚，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她从阿姆斯特丹大学神学系毕业后，到荷兰最南端的林堡煤矿区做社会工作者。那里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矿工大都是从德国和东欧来的新移民。由于十分同情矿工的处境，加上性格直率，她和煤矿管理当局的关系很快变得非常紧张。1923年，她和一位矿工领袖有了爱情关系，怀了孕，她慎重地选择了做未婚妈妈。此举在她所属的小资阶层激起很大的波澜，她和儿子威廉不得不离开荷兰去德国和意大利旅居了很多年，靠写作和翻译维持生活。1928年回到荷兰后，她成为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社会党党员，成功的写作和政治活动使她越来越出名。1934年，她又一次做了未婚妈妈。这次，她在瑞典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就是我。她给我取名克里斯托弗，小名立科。第二年她回到荷兰，嫁给了施佩尔牧师，他把我和我哥哥都看作他的亲生儿子。

母亲很有个性，也很有幽默感。在遇到困难时，她总能看到好的一面。尤其重要的是，她充满热情、爱心和同情心。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会交到朋友，并通过拜访、写信和邮寄礼物维系友情。她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故事大王，我就是在听她那些无穷无尽的真实的或编造的故事中长大的。她结婚后，我们家就安顿在水手村了，我最早的童年记忆主要来自那荷兰北部的乡村。

牧师馆的童年

我们家住在村子里的牧师馆里，这是教堂旁边一座比较大的房子，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村子里其他的人住在农场，他们饲养荷兰奶牛，每天两次人工挤奶，然后送到一个加工厂，经消毒后制成饮料、黄油和奶酪。每个农场还会养几头猪、几只鸡、一头山羊和一些产羊毛的绵羊，到处都是放牧的草地。

村子建在“圩田”上。这里原来是海的一部分，几个世纪前修了海堤，围在里面的海被风车抽干了水就变成圩田了。实际上我们住在低于海平面约7米的地方。我们家旁边就是拦截外面海水的大海堤。过去，海堤被冲毁过好几次，不少村庄被湮没，死伤无算。母亲在一本儿童书里曾描述过16世纪发生在我们村里的水灾。在我们这个时代，水利技术已大大改善，大海不再危险了。

我们家穷。父亲做牧师的薪水很低，母亲必须拼命翻译和创作儿童作品来接济家庭，但和现在一样，当时文学作品的稿酬也少得可怜。

我们的生活很简单。一天两次吃黄油面包，一顿主食是土豆炖蔬菜。蔬菜是自己菜园里种的。每天傍晚，我负责到附近的农场去取牛奶。农夫给我倒满一小盆刚从母牛身上挤出来的还带体温的牛奶。为了不要把牛奶洒出来，我每次都小心翼翼地走在乡间的小道上。每星期我们只吃一次猪肉，鸡肉太贵了难得一见，连鸡蛋也很少吃。喝咖啡是件奢侈的事，更不用说啤酒、葡萄酒或烈酒。

但我们并没觉得这种生活艰苦，我们都健康、快乐，虽然我一直很瘦小。母亲常说我们很幸运，有稳定的收入，当时有不少人由于30年代的经济危机失业了。

我比我哥哥威廉小10岁。父母要工作，村子里和我同龄的孩子也没几个，所以我经常很孤单。母亲家务不太忙的时候就坐在二楼的小屋子里，在打字机边写书稿。她也参加社会党和地方委员会的活动，

还协助父亲做好牧师工作，并且有两个儿子需要照料。虽然囊中羞涩，家里还是经常宾朋满座，需要招待。她每年写一到两本书，翻译同样数量的书稿，同时还为各种杂志撰写稿子。

我主要在花园或厨房里玩。我常用草或树枝做成小船，把它们放在花园边上的小水沟里航行，我总是跌进泥水里，好在水不深。我还喜欢爬果树，不管树上结的是什么果子，熟不熟的，我都摘着吃。有时候从树上掉下来。母亲并不禁止我做这些事，也不警告我要小心。我虽然瘦小，但不病弱。我总在做梦，满脑子都是自己编造的故事。母亲希望我和哥哥长成强壮、勇敢的男人，认为她过多的关爱会让我变得女孩子气。

有一次，这种自由导致的结果是，我把房子点着了火。事情是这样的：我喜欢在我家阁楼上玩耍，上阁楼的梯子很陡。那时候没有电，我点了根蜡烛。这个阁楼用几片木绒保暖。包木绒的纸烂掉了，木绒露了出来。我把蜡烛放在其中一片木绒上，想看它会不会着火。天啊！它真的点着了！幸运的是母亲刚好从二楼的书房出来，看见了火光。她跑到花园，取出花园里的水管，装上水龙头，浇向已经烧旺了的熊熊大火。她成功地在房梁和椽子烧着之前把火灭掉了。当时，有人已给邻近镇子的消防局打了电话，半个小时后红色消防车开到了我家门口时，我们一家人已经从慌乱中恢复过来，坐在客厅里喝咖啡了。我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惩罚。第二天当地的报纸报道了这件事，还登了一张我的照片。一个邻居把报纸拿给我看，并责怪了我。我这时才明白是自己惹的祸。

母亲不守旧，却保持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如果她认为确有必要，她真的会惩罚我，那时我还真的挨了她不少打。我父亲从不打人，他的心太善、太软，下不了手。母亲也极少夸我，她不想使我骄傲。然而她常常把我拉到怀里，对我说她多么爱我。

她不许我对衣服和食物说三道四，表示喜好或厌恶，因为“不管上帝赐给我们什么，我们都要心怀感激地接受”。她经常强调努力工

作、生活俭朴、有勇气和毅力的重要性。但在玩具方面，她很慷慨，送我好玩的玩具，带我去好玩的地方，如阿姆斯特丹的动物园。5岁时，我父母送我一辆小自行车。每天晚上，母亲都会坐在我床前给我讲故事，这方面她可是高手。

她还鼓励我读书识字。我5岁时，她找了乡村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做家教。我很快就能自己读书了，并开始阅读家里的藏书，包括母亲写的。

当然，我们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上教堂。我们就住在教堂隔壁。每个礼拜日父亲都在教堂布道，那里还举行婚礼、葬礼和宗教庆典，圣诞节尤其重要。那时，虽然家庭生活都离不开教堂，星期天来做礼拜的却寥寥无几。只有几位教会成员和上了年纪的妇女才定时光顾。我们全家人：母亲、哥哥威廉、保姆（我们有时雇佣一位）和我肯定去。我3岁时就开始去教堂了。父亲讲道时我当然什么也听不懂。中间休息时，教徒们唱赞美诗或其他圣歌。歌声旋律优美，管风琴余音绕梁。母亲记得我第一次去教堂时，在听布道时变得很不耐烦，就站起来大声说："来吧，让我们再唱一首动听的歌曲，然后回家吧！"

星期一到星期六教堂没有活动时，我有时带上教堂大门的钥匙，溜到教堂里玩。我喜欢看放在长椅上的大部头圣经，也喜欢爬进钟楼看教堂的大钟。教堂旁边有一小片村里的墓地。里面有好多古老的大理石墓碑，刻着各种各样的碑文，那也是一处我喜欢玩的地方。

我父母允许我在教堂和墓地玩，似乎不可思议。我父母不仅是教徒，而且是神学家，但他们并不保守，他们不觉得我在圣地玩耍有什么不妥。他们也不排斥其他宗教。母亲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读书时，很欣赏比较神学教授H.海克曼的课。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中国的佛寺和道观里生活过很长时间，对中国宗教有深刻的认识。

村子里和我同龄的孩子没几个，住得也很分散。我父母鼓励我和农民的孩子交朋友，可是彼此见面不容易。他们和我玩的方式也不一

样。我通常沉浸在母亲讲述的故事中的幻想世界中，把自己想象成骑白马穿过森林奔向城堡的骑士，或是一个弹着鲁特琴的游吟诗人，或其他浪漫人物。我的衣着和别的孩子也不同，我当然也穿木鞋，这和村里其他孩子没有两样，但其他的就完全不同了。母亲欣赏俄罗斯民族，喜欢给我穿俄罗斯风格的短衬衫和用皮带束起来的高领外衣。这些衣服是斐丽特做的，她是母亲以前从德国请来的朋友，后来就留在了荷兰。她嫁了一位德国油画家，住在邻近伊顿市的一座小巧玲珑的老房子里。斐丽特会来牧师馆住上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她还照看我，给我做一大堆衣服。她甚至为我做了一套王子服，配有一顶带羽毛的帽子和一把木剑。

我出生的前几年，我外祖父、外祖母做了一次环球旅行。他们游历了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美国。我从没见过我的外祖母，因为我出生后不久她就去世了。她每到一个国家都收集该国家的玩偶，后来都留给了母亲。俄国、中国和美国印第安人的偶人很漂亮，我想玩的时候，她就会给我玩。

记得我4岁生日时，家里有一个聚会，虽然我不记得是否有其他孩子出席。村子里的一些胖女人来喝茶，送了我一块巧克力。

在荷兰，孩子们最大的节日并不是圣诞节，而是圣尼古拉斯之夜。每年12月5日庆祝这个节日。如果谁家有小孩，年纪大一点的亲戚或是朋友就装成圣尼古拉斯，戴上全白的胡子和一顶大红帽，手持主教杖，和化妆成摩尔人的男孩一起来，背着一个装着糖果和礼物的袋子。孩子们必须和圣尼古拉斯见面，他会问他们表现得好不好，然后再送他们礼物。我外祖父是位善良的老绅士，他长着真正的白胡子，为我扮圣尼古拉斯。

一次，村子里的学童和隔壁东宅镇的孩子演了一出戏剧，是根据格林童话中的矮妖怪故事改编的。我被整个演出吸引住了，尤其喜欢扮演嫁给国王的磨坊主女儿的那个小女孩。我立刻坠入了情网，她是当地石匠的女儿，10岁了，而我只有5岁。我竭尽所能去追她，请她

到我家里玩，讲好笑的故事取悦她。她答应来我家玩，但在我送她回家的路上，她明明白白地对我说：她听够了我的故事，要我别再缠她。这是我的第一次失恋。

战　　争

不久，战争爆发了。那是1940年5月的一个的早上，阳光灿烂，我和父亲站在花园里，一架德国飞机飞了过来，飞得很低，在我们村子上空投下了雨点般的传单。我捡起一张，和父亲一起念了起来，上面印的是德国人的宣传。父亲向我解释说，德国人已占领了我们的国家。晚上，我们听到了爆炸声，母亲看到南边的地平线升起一道火光。她说，“阿姆斯特丹在燃烧”，同时开始哭泣。她是阿姆斯特丹人，对这座美丽的城市感情很深。实际上，阿姆斯特丹逃过了一劫难，只是一些港口设施遭到轰炸。全城遭毁的是鹿特丹。不久后，那里无家可归的孩子来我们村子避难。除此之外，我们小村子里的生活和以前没什么两样。

那个时候，荷兰的小学在复活节开学，所以我在1941年的春天才入学。学校在邻近的东宅镇，离我的村子有二、三公里的路程，我每天骑车去上学。虽然是一个镇的小学，其实学生并不多，老师只有三个，教室也没几间。一、二年级分两排在同一个教室里由一个老师上课。当时我只有六岁半，不过我母亲认为我已经懂得不少东西，应该直接上二年级。我的老师丝却不同意这么做。因为她不高兴我母亲的提议，结果她既不让我上一年级，也不让我上二年级，而是在一、二年级桌椅之间的过道上放一只凳子叫我坐，什么都不教我。课间的大半时间我都在打瞌睡。

我在小学的困难还不只是年龄和不上不下的班级问题，也因为我长得和一般荷兰小孩不很一样。六岁多的我不仅比同龄的孩子个子小，而且我的头发很卷，颜色也不像普通荷兰人的那样金黄。加上我的性

格内向、害羞，所以小朋友们都笑我是女孩子。有一天，我偷偷跑到隔壁的理发店，要求理发师把我的卷发剃光，说我母亲后来会付钱给他。我母亲很理解我的心事，没有责怪我这么做。没料到第二天当我光着头出现在教室门口时，同学们笑得更厉害了！

有一次我又在课间睡着了。丝毫特玛科太太过来摇醒我，并冲着我叫："你不可以在课堂睡觉！"我迷迷糊糊中抗议道："我可以不睡觉，但请您不要对我这么乱吼乱叫！"听我这么说，她觉得很尴尬，气急败坏地把我拖到地下室的煤球间整整关了一天。而且，这也不是唯一的一次。

不久，东宅镇小学以天气寒冷没有煤球供暖为由关门了。我告诉我母亲他们骗人，地下室有的是煤球。母亲问我怎么知道，我这才告诉她自己在地下室度过不少时光。

那年九月，母亲送我去邻近瓦德村的小学。这个学校更小，老师是一对夫妻。虽然从我们家去瓦德村的路程比去东宅镇短，可是这一段路不好走，无法骑自行车上学。母亲就和老师商量，让我寄宿在他们家，每个周末回水手村的牧师馆一次。在这里又一次证明这些年轻的老师拿我没办法，他们不让我去教室听课，却把我关在小阁楼上又黑又冷、脏乎乎的卧室里，我整天就那么呆坐着，看对面学生们上课和课间在院子里嬉闹的情景。

没多久就是圣诞节，回家后我表示再也不去上学了。母亲这才决定把我送到荷兰中部乌特勒支附近的比尔托芬儿童公社去生活。她告诉我，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学费很贵，但我在那儿肯定会高兴。

儿童公社

儿童公社真正的名称是工场（werkplaats）。儿童公社是对它的性质荷兰文Kindergemeenschap的翻译。这是一所为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孩子开办的实验学校，由宗教和社会改革家盖思·伯克建于1929

年。盖思是一位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反对战争，反对资本主义和专制政府。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同时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工程师，有很深的音乐造诣。他曾经到英国求学，在伦敦遇到了出生于富有的教友派家庭的贝蒂·吉百利，并和她结了婚。

起初，盖思想推动一种新运动，创办了一个“兄弟会”，目的是让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如何创造一个新社会，一个财产公有、共同生活的新团体。当贝蒂得到吉百利家族的一大笔财产时，他们决定把一部分捐给教友会帮助穷人，另一部分送给家族工厂的工人们。但他们拒绝纳税，因为政府把纳税人的钱花在军队和购买武器上。这给他们惹了不少麻烦，盖思为此好几次被监禁。直到有一天他们意识到社会改革的办法不是反抗而是教育。他们搬回到荷兰，定居在乌特勒支附近的比尔托芬。1929年，盖思和贝蒂先把自家的八个孩子组织起来办了一个边工作边学习的“工场”。不久一些欣赏这种教育理念的人也把孩子送来让他们教育。20世纪30年代，当墨索里尼开始在意大利掌权时，著名的启发式教育创始人玛利亚·蒙特索里博士逃亡荷兰，盖思曾和她见过面，一起讨论关于儿童教育的一些问题。

正如他认为所有的工厂应属于工人，而不是资本家老板，在盖思发明的这种新教育体系里，学校属于孩子而不是老师和主管。为了说明他的理念，他把自己的学校叫作“工场”，把学生叫作“工人”，把老师叫“工友”。孩子们不仅可以按自己觉得合适的方法上学，而且原则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盖思相信，孩子天性善良，天生具有学习和工作的欲望，只要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责任，放手让他们去干，自然会长成出色的人才，成为一种新型的人类。

我来到“儿童公社”时，大约有一百来个学生。这里没有教室，没有集中一拨子学生坐在下面听老师在台上讲课的事。没有普通的班级，而是按颜色来分队。比如，紫队相当于普通小学的一到三年级，蓝队相当于四到六年级，黄队相当于初中，橘队相当于高中。橘队几乎没什么人。我们也有一个公共的大房间，每个孩子有自己的桌子和

椅子，可以随便把座位搬到自己喜欢的任何角落。因为我们平时不用上课，公社负责人把所有的教材编成卡片，放在墙边的资料柜里。卡片上印着学习科目：算术、拼写和语法、历史、地理等。这些功课按从易到难的顺序分类，我们随便从资料卡片里抽取自己喜欢的科目去做。做好之后给一个“工友”看，他检查我们做得好不好，有问题会帮助我们解决。完成一系列的作业之后，“工友”在助理的协助下，会给我们出一个小测验。如果我们通过了，那部分教材就算学会了。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做功课的用功程度，自己决定学习材料，自己选择完成学习任务的期限。因此，我们必须学会独立完成学习和工作任务。

不要以为这是一班子自由散漫的乌合之众。公社有一些非常严格的章程。比如每天早晨七点半到八点之间就要到“工场”参加集体活动。这在冬季寒冷的荷兰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我们有自己的菜园，每天中午我们都留在儿童公社自己做午饭，有时候就是吃自己种的蔬菜和马铃薯，虽然煮得很难吃。此外，我们必须打扫公共卫生、修理损坏的家具、上油漆等。

还有社区活动。每星期开始的时候，大家集合在一起唱歌。盖思教我们很多歌曲，用不同的语言唱：英语、法语、德语、甚至俄语。他自己也谱写了不少歌曲。

每周都会举行一次全社孩子和大人参加的大会，一次年段小会。每个人都要在会上检讨自己一个星期以来的所作所为，其他人可以批评帮助。我们有一些绝对不能做的事，比如，在这个讲究男女平等的地方，女孩子不能踢的足球是被禁止的。有一次，我和几个男孩子偷偷溜到远处去踢球，结果被举报了。在那一周的全社大会上，我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表示要改正。结果，另一个男孩子却站起来表示不服气，他认为足球是一种男孩子的活动，他就是喜欢，并骂我是伪君子。我非常生气，不理他。可是大家认为我这个态度也不行，虽然他的认识不对，我不应该计较，而是要帮助他改正。

我很喜欢儿童公社的团队精神，也逐渐适应那里的生活。只是

刚开始时，因为我的木鞋和我的荷兰南部口音，大家都取笑我，不过，不久我就交上朋友了。我喜欢那儿的自由氛围，尤其是音乐。盖思对巴赫和海顿的清唱剧、莫扎特的安魂曲和许多其他著名的音乐作品都有研究，他办了一个合唱团。由于我的嗓音很好，也被选入合唱团演唱。我们学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我特别喜欢它，不久我就能背下全曲。我们还画画，做泥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喜欢枯燥的算术和语法。我开始模仿母亲，着手写一本儿童书，当然没写成。

比尔托芬是一个富有的小城，周围有很多美丽的乡间别墅。儿童公社坐落在郊外，附近有一大片松树林。我们的大部分自由时间都花在森林里玩强盗和打劫的游戏。秋天，我们在树林里采集各种可以吃的菇和栗子。我特别喜欢那片松树林，每当我回到比尔托芬，那弥漫在空气中的清香总令我感到喜悦。

儿童公社的费用不低。村子里的学校是公立的，可以免费入学，而儿童公社是私立学校，必须付学费。交多少钱我不知道，我猜想有部分折扣，因为家里没那么多钱，而且母亲和盖思有点交情。记得我被一再告知，能上这所特殊的学校是多么幸运，我应该感激父母为我花了那么多钱，还有生活费。我刚开始住在学校宿舍，和许多从荷兰其他地方来的学生共住。我当时7岁，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如果说我曾经很想家，那我一定把这种情感抑制了，因为现在无论如何回忆不起来有那种感觉。实际上，当比我大的孩子哭着想父母、想回家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太女气了。母亲一直教育我要成为一个坚强、有勇气的好男孩。我通过显示独立精神和自理能力来证明自己。儿童公社所在地比尔托芬镇在荷兰中部，那时从水手村到那儿要走很长的路。我刚入学时是先坐汽车到东宅镇，然后换马车到普纳冷。从那里有一趟小火车到阿姆斯特丹北面，之后坐轮渡到阿姆斯特丹火车站，乘火车到乌特勒支，最后换车到东边的比尔托芬。到了目的地后，还要走很长的路才到儿童公社。近一百公里路程，我们颠簸了一整天，

到夜里才到达。

当然，第一次去是要有人陪的，但后来放假回家，我尽量自己解决部分或整个行程。我知道坐什么交通工具，会自己买票，当然我看不懂时刻表，所以每当我不清楚该坐哪班火车或汽车，在什么站台上下车时，我就问别人。能照管好自己，让我很引以为自豪。只是到了很久以后，当我自己的孩子7岁时，我才意识到那个年龄是多么幼小，才开始疑惑自己这段经历的意义。

我和石匠女儿不幸的初恋早已过去了，但在儿童公社，我又一次陷入绝望的单相思。这次我爱上的对象是盖思的小女儿玛雅，她大概比我大10岁，我非常崇拜她。她几乎不认识我，更不会知道我多么爱慕她。我的爱情持续了将近一年，最后病倒了。我想要是我生病了，就有人去告诉她，她可能会来照看我。结果我真的病了。那时，我们正在荷兰北部的一个岛上过夏令营，我马上被送回比尔托芬，让一个医生照料我。过了很久，这场相思病才逐渐淡忘。此后，我一次又一次地恋爱了，不过爱上的都是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女孩。我从没敢对她们表白，每次我都备受折磨。只有在成年之后，这个问题才不再出现。

我的哥哥威廉

父母决定把我送到儿童公社时，主要是考虑到我们住的地方没有适合我的学校。威廉听得这个消息，提出也要去。实际上，当时他已经17岁，而且辍学3年多，这时却出人意料地表示要重返课堂。

威廉在很多方面和我不一样。我总是很瘦弱，耽于幻想，而他却强壮、活跃，爱干活，喜欢动物和农场生活。尽管他很聪明，却有学习障碍，因为他不能拼读。这是我们家族的遗传症，我幸运地逃脱了这一厄运。在今天的西方社会，拼读困难症是一种常见的儿童教育问题，可那时的教育者不了解这一点。一个孩子如果有拼写和书写问题，

就被认为是愚钝而不适合高级教育。我可怜的哥哥深受此害而离开了学校。那时候，荷兰的义务教育实施到14岁。所以威廉一到那个年龄，就请求父母允许他离开学校，去做一个农民。由于我父母没有农场，也没钱买农场，就让他先在附近大农场里干点农活。威廉喜欢他的新生活，学会了挤牛奶、剪羊毛，能双手同时提两大桶牛奶，及其他成年人干的体力活。

我母亲对此很高兴，也很自豪。她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工人和农民比商人和知识分子强。她希望自己的儿子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成长，而不是被培养成为资本主义的寄生虫。威廉想当农民正合她意。至于我，她希望我当个木匠或裁缝。有天分的话，也许当一个艺术家也不错。后来我上中学时，她常说她不希望我成为知识分子，而是希望我学门手艺，做自食其力的诚实工人。

威廉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尽管有拼读问题，还是很喜欢学习。在农场干了两年后，他进了为年轻农民办的夜校。我就要离家的时候，他想也许儿童公社那种自由教育对他是个机会。于是，1942年的2月我们一起去了儿童公社。但他比我大得多，很快就交了许多和他同龄的朋友，压根没照顾我。后来，1942年7月，威廉年满18岁，被德国人征去做劳役。为逃避这次服役，他离开了学校，在阿姆斯特丹隐藏了起来。他还结了婚，生了儿子，以我父亲的名字克拉斯为孩子命名。在阿姆斯特丹期间，他继续自学，到了1945年阿姆斯特丹解放时，他顺利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因为他的数学成绩不错，秋季他考取了荷兰著名的瓦革宁亨农业大学。直到写毕业论文时他的拼读问题再度被发现。但由于总成绩出色，他还是拿到了学位，成为农业和食品领域的专家。我哥哥的大学教育对于母亲来说是个很大的经济负担，尤其在父亲1949年久病去世之后。尽管威廉没有成为她以前设想的工人或农民，她还是为他的成就感到骄傲。

父母的营救犹太人活动

我父母不仅是社会主义者，反对希特勒的纳粹政权，而且他们也尊敬犹太宗教和文化。根据荷兰的学术规定，父亲在1938年通过博士答辩时必须提出一些科学“见解”。在他的见解中有一条就是“反犹主义与信仰上帝是不可调和的”。同年，他还组织了“反对迫害犹太人”的活动。

在荷兰，第一次驱逐犹太人的事件发生于1942年。但在此之前，母亲已开始广泛联系群众，帮助并保护大批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逃亡过来的犹太人。她想以此来组织对纳粹的和平抵抗运动，因为她反对任何暴力行为。

1942年，我哥哥和我离家时，她请了一个木匠（是她的一位共产党朋友）到我们住的牧师馆修了一些秘密藏身处所，这在那栋满是犄角旮旯的老房子里并不太困难。经过改造后的房子，最多可以藏匿15个犹太难民。

母亲组织了一个地下抵抗网络，救助那些随时可能被送往集中营的犹太人。那时躲藏起来逃避德国人的捕抓被称作“潜水”，躲藏的人叫“潜水员”。我家是这些“潜水员”的中转站。每当母亲听说有人希望躲避德国人的驱逐，她就会安排这个人到我家，时间最好在邻居睡着的半夜。然后再设法在对她的事业抱有同情心的人群中寻找一个长久的藏身处。一般来说，这些人都是纯朴的当地人，会接待一到两个人，住上一段长短不定的时间。母亲在劝人们收留受迫害的犹太人时很有说服力，她的确救了不少犹太人。

1943年春天我从儿童公社回家过复活节，我先在阿姆斯特丹和母亲碰头，那是在市中心租的一间小房子里。那天晚上她告诉我，我会在家里遇到很多从未见过的人。她给我解释说，这些人处境危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能对别人透露半点消息。不然的话，这些无

辜的人就会遭到逮捕和杀害。她还说，她把什么都告诉了我，因为她知道我是个大男孩了，告诉我这个秘密是对我的信任。

我完全明白我的责任，也确信自己能够不辜负母亲对我的信任。那些避难的人分散在我们房子的每个角落，男女老少都有。白天，那些人都聚集在客厅或其他地方，母亲则忙于照管他们。一旦有外人来访，大家立刻躲起来。幸运的是，我们的牧师馆和教堂是在旷野里，单门独户，白天有人来，老远以外就能看见。而且，母亲在邻近东宅镇的关系网一发现可疑的事或有可疑的人朝我们的方向走来，会提前给她打电话报警。

母亲必须照料那些难民，给他们提供食物。她不能过于依赖附近的农民，因为这会引起怀疑。于是她自己骑自行车去其他地方的市场和农场找食品。在一次雨天回家的路上，她被一辆马车撞倒了，车轮碾过她的腿和脚踝，造成了骨折。母亲折断的脚踝复位后打上了石膏。当时她本该好好休息，这样她的脚和踝骨才能康复。但她忙得没时间休息，伤势刚有好转就马上骑着车为了那些犹太难民的事到处奔走。

许多人来过我家，我只记得其中的几个。我非常喜欢霍夫曼夫妇，他们在我家呆了很久，因为霍夫曼太太怀孕了。她临产时，母亲以一位地下网络朋友的名义安排她住进了附近的一所医院。孩子出生后，母亲为他们找了一处永久“潜水”的地方，一直住到战争结束。战后，我们之间一直保持很好的友谊。

大部分在我家避难的人时间都很短，我没见过或记不得了。战后许多年，有时会听到有人说他们曾经在我家逗留过。比如，母亲救过的路得·李普曼，她不仅是犹太人，还是德国共产党的一名重要成员。希特勒上台后，这位非凡的女士逃到了荷兰，化名“路得·斯托克”从事营救犹太人的地下工作。她以惊人的勇气冒着生命危险在欧洲大陆甚至德国活动，营救她的犹太同胞。当时，她在德国已被判了死刑。她后来住在苏黎世，在她83岁时出版了一本自传，其中讲述了1943年她遭到盖世太保的疯狂追捕，到处“潜水”而找不到安全的地方。她

写道：

> 我给水手村的牧师馆打电话，问他们能否收留我。牧师的妻子马上说可以，并告诉我去她家的详细路线。这个电话被盖世太保监听了。
>
> 我早就听说过这个牧师和他的妻子，因为他们一直在帮助营救犹太难民。他们警告我那里迟早会被发现，但他们还是随时准备接纳我。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们。牧师是位虔诚的教徒，荷兰有不少这样的人。他的妻子特别活跃，庇护犹太儿童和地下抵抗组织者的孩子，我在那儿的时候，满屋子都是孩子。
>
> 就在我到达的那天夜里，牧师正在楼下上教义课，突然来了两车党卫军，他们搜查了整座房子。在最后一刻，汉妮把我塞进了一个存放衣物的大壁橱里。这是唯一一个没被搜查到的地方！一名党卫军在壁橱前走来走去，透过橱门的缝隙我能看见他的高筒黑皮靴。外面闪着亮光，壁橱里一片漆黑。在恐惧和战栗中，我侥幸躲过了这一劫难。施佩尔夫妇确实令人敬佩。（路得·李普曼：《也许幸运不仅是偶然的》）

当我在几年前第一次读到这一段文字时，突然记起母亲五十多年前跟我讲起的同一件事。她说党卫军的突然搜捕是因为有一个正被通缉的叫“斯托克”的女人躲在我们家。有人看见她了，报告了盖世太保。他们到村子的时候，母亲看见了汽车的灯光，及时地把路得藏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德国人进屋的时候，母亲哭喊着：“啊，太可怕了！你们来抓我儿子了。”（我前面说过，我哥哥被德国人征了劳役躲藏起来了）当军官声明他是来抓犹太女人时，母亲假装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认定他和他的部下是来抓我哥哥的。她哭闹了很长，使德国人将信将疑，认为房间里没有犹太人。他们最后搜查了一遍房子，但不太彻底，所以没有找到路得。第二天，路得被偷偷地转移出来，带到

一处长久的藏身之地，在那里一直待到战争结束。

我不知道路得为什么写“房子里到处都是孩子”。她一定是见到了铁欧，一个9岁的犹太男孩，他刚刚来到牧师馆，就在家里无拘无束地走来走去，因为我父母对外说他是我家的小亲戚。我不认识其他的孩子。路得当然没有见到所有藏在我家的人，因为晚上他们已经到藏身处休息了。比如，霍夫曼夫妇那时也躲在我家。盖世太保没有发现他们。路得说，她的藏身之处是唯一没被发现的地方，她说错了。

铁欧是个犹太男孩，他母亲把他托付给我父母。她是个年轻的女人，嫁了一个上了岁数的犹太富商。他被捕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儿子逃脱了。后来她遇到一个积极从事地下抵抗运动的荷兰青年，两人决定把孩子送到别的地方住比较方便。所以铁欧在1943年的春天就到我家了，当时我还在儿童公社。我回家过复活节时，他已经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了。我们经常在一起玩。铁欧比我大半岁，在很多方面比我成熟。他在城里长大，家庭富有，见识比我广。他不抱怨在牧师馆的生活，但他一定觉得这里的日子没有他所习惯的那种生活那么舒服。他也很想念父母。

路得·李普曼的事情发生后，母亲决定多加小心，至少一段时间内，不再安排“潜水员”了。但在那一阶段，搜捕犹太人的活动愈演愈烈，很多人在逃命，不久我家又和从前一样挤满了人。1943年6月，灾难降临了。半夜时分，纳粹进行了第二次突袭。出卖我们的可能就是同村人，在那时这样的告发能得不少奖金。这次来了10个党卫军，几个守在房子外面，其他人进屋搜查。他们当中不仅有德国人，还有荷兰人。所有的犹太人已经藏了起来，但铁欧是作为亲戚留宿的，就睡在我的床上。一个荷兰人唤醒了他，和蔼地问他：“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从阿姆斯特丹来的犹太孩子。”铁欧从睡梦中醒来，回答说：“是的。”那人把他从床上拉下来，让他穿上衣服，然后把他抱在腿上，拿出一块巧克力，对他说：“你告诉我别人藏在哪里，这块巧克力就归你了。”铁欧说出了所有人的藏身之处，他们都被捕了。他们还问他自

己的妈妈在哪里，还有和她同居的年轻男人的名字，他也说了出来。

当时有6个犹太人，算上铁欧是7个人藏在屋子里。他们被集合起来，带到了客厅，靠墙站成一排。突然，有人从窗户跳到花园，跑掉了。他藏在房子附近芦苇塘的浅水里，死里逃生。

剩下的人被押上汽车送到了阿姆斯特丹。父亲被关进了阿姆斯特丹的中心监狱，犹太人则被带到临时拘留中心，一个叫“荷兰剧院”的地方，在那里等着被送到集中营。铁欧也被带走了，被关在离荷兰剧院不远的一个关押犹太儿童的地方。母亲那天晚上没在家，她在前一天去了荷兰中部一个地方为难民收集假身份证，所以才幸免于难。

几天后，母亲乔装改扮，拿着别人的身份证去了铁欧的关押中心。她自称是铁欧家的邻居，说给铁欧带了去德国的钱和衣服。由于犹太人的大部分私人物品都被没收，门卫也得到一部分，所以他放我母亲进去。她在大厅里很多孩子中间找到了铁欧，悄悄地把他带出了那个地方。她具体怎么做的，我也不清楚。铁欧1970年去世前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从一个后门走了出去。就这样，铁欧死里逃生。其他在我家被捕的犹太人没有一个从集中营生还。至于父亲，他被拘留了很长时间，勉强躲过了死刑。他很文弱，身体不好，1944年从人满为患的监狱里释放出来。出狱后，他继续与地下抵抗组织联系，再次被捕。他又一次躲过了死刑，最后获释。

躲藏时期

事件发生后，母亲到了比尔托芬的儿童公社来告诉我家里出了事。我当时正住在一个“工友”的家里。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她从我们住的巷子里走过来的样子，以及她讲述事情经过时的严肃表情。那时，盖世太保已经确认在我家藏匿犹太人的主犯不是腼腆、不食人间烟火的父亲，而是母亲。因此，他们对她下达了逮捕令。

母亲并不是我家唯一被追捕的人。哥哥威廉也因躲避德国人的劳

役藏了起来。他用假身份证和妻子、儿子克拉斯藏在阿姆斯特丹犹太区一所废弃的房子里。犹太区原来的居民不是被抓到集中营，就是躲藏起来了。母亲在离哥哥家不远处，阿姆斯特丹王子河旁边的一座老式房子的阁楼上找到自己的避难所。那屋子还躲着另外一对犹太夫妻。

母亲是阿姆斯特丹人，她的大哥也住那儿。他叫达科·高柏，是位杰出的古典文学学者，后来又学了心理学，他建立的心理测量研究所是欧洲最早的心理研究机构之一。他还是荷兰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布冉、次子沙柏和我母亲同一时期加入了反纳粹运动。这两个当时只有17岁和19岁的年轻人，选择了武装抵抗。两人都是共产党抵抗组织“CS-6”的成员，他们的目标是除掉纳粹的重要领导人及其同伙，营救犹太人。

布冉帮助犹太人搞假身份证，并组织他们从荷兰逃到安全的地方。他协助了一大批犹太人逃出荷兰，经比利时和法国前往瑞士。1943年夏天，他在荷兰和比利时的边境被捕。

他的弟弟沙柏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个放映德国宣传影片的剧院里放了一把火，当时剧院没有人，但整个建筑全烧毁了。这让他大为有名。后来，1943年8月19日，沙柏参加一次刺杀行动，干掉一个经常把犹太病人出卖给纳粹的罪大恶极的医生之后，他骑上自行车逃走。不幸的是，一个擦窗户的人听见有人叫喊，低头看见一年轻人骑着车在街上飞奔，误以为他是贼，就把梯子横在路上，阻止他逃跑，沙柏跌倒被抓。擦窗人事后知道自己的过错，后悔不已。布冉和沙柏受到严刑拷打，他们和他们的其他战友一起在1943年10月1日惨遭杀害。今天，阿姆斯特丹有一个以沙柏·高柏命名的公园。

母亲在阿姆斯特丹藏身的时候，我还待在儿童公社。到了暑假，母亲带我和一个我在公社的同学去荷兰南部的一个农场。这个男孩叫山姆·赛格尔。他的父母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工人，全家都被逮捕，只有山姆在最后关头被他母亲托付给一个朋友，后来辗转到了儿童公社。战后他家只有山姆和他的一个妹妹幸存。

山姆是一个小天才。当时我们有好几个男孩子一起住在一个“工友”家，山姆是我们的头。在学校里他是好学生，不仅数学好，还会写诗，大家都赞扬他，喜欢他。他也是我们去村里的小铺子偷糖果和其他小东西的领头人，还为此发明了一种只有这一拨子人听得懂的联络暗号。山姆甚至会用在我看来十分复杂的零件装配收音机。由于我是最小的一个，那些大男孩往往不让我参加他们玩的把戏。我非常想演试一下他们的技艺，等他们偷东西被逮住受罚时，才有机会自己单枪匹马去碰运气，结果当场被抓，大大吃亏。

我们去的南部那个农场相当穷。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收留我们，他们让我们呆在一个废弃的鸡舍里，在水泥地上铺些稻草，晚上我们就睡在稻草上。我们用一个小煤油炉做饭，但没什么可煮。还好，那位肥胖的农场女主人对我们很友善，有时会给我们一片烤面包。这就算是款待了！卫生条件很糟糕，我记得一天早上醒来，听到稻草下面有吱吱声。我翻开稻草，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叫，结果看到了一窝刚刚出生的小老鼠！

我们在田野里玩耍，或讲故事打发时间。和其他孩子一样，我们也找各类死掉的小动物、小虫子给它们举行葬礼。我们还唱儿童公社学来的各种歌曲。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唱得带劲的时候，母亲从田里朝我们走来，挥着一张报纸高兴地喊：“盟军占领意大利了，墨索里尼下台了。”那应该是1943年7月25日前后。